流动农村人口心理困扰成因研究

——一种社会互动的视角

□ 李红琼　黄正泉　梁剑宏

摘　要:基于社会互动观点,流动农村人口本身心理状况是完全正常的,其存在的心理困扰不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而是藉由不良的人际互动的结果。流动农村人口在人际互动中采用传统习惯的社会取向(包括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及他人取向等),却遭遇社会与生活环境变迁,而形成家族取向的困难与矛盾,关系取向的失衡与错位,权威取向的丧失与消解,他人取向的缺位与敏感。社会取向难以为继,这才进一步造成流动农村人口的矛盾、失衡、孤独、不安与无所归依感等心理上的困扰。

关键词:流动农村人口　心理困扰　成因　社会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9)03－063－04

所谓流动农村人口主要是指在城镇化浪潮中大批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村人口。流动农村人口的心理健康及其救助问题已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对流动农村人口的心理认识,大多属于心理学的专业范畴,这容易导致对当前流动农村人口心理问题认识的严重化趋势。其实我们如果真正了解这一群体的话,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这一群体的心理问题并不是心理疾病。相反,流动农村人口本身心理状况是完全正常的,其存在的心理困扰不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而是藉由不良的人际互动的结果。根据社会互动的观点,人的日常人际互动都以本人为核心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圈,展开与他人的人际互动,其互动方式一般存在以个人或以社会为中心的两种不同取向。[1]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于社会取向的关系方式。杨国枢先生曾将传统中国人的社会取向分为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即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及他人取向等。[2]本文对流动农村人口心理困扰的形成原因分析,就建立在社会取向概念基础上,认为中国流动农村人口也是直接秉承传统社会取向习惯展开自己的社会生活。但显然,他们所遭遇的现实已经使他们的生活不能再依据习惯方式来进行。在这里,我们姑且假设流动农村人口按照习惯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从中感受他们因习惯方式遭遇环境变迁而陷入的困境。

一、家族取向面临的困难与矛盾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的首要特征是一种家族主义的特征。不论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还是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家族主义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家族取向,就是个人生活凡事以家族为重,个人生活圈的基本组合也以家族关系为主要组成部分,家族的荣辱重于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团结重于个人的自主,家族的目标重于个人的目标。家族主义作为一种心理与行为倾向,体现在对家族的认识、情感和意愿三个方面:从认知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强调家族延续、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家族富足以及家族荣耀;从情感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一体感、归属感、荣辱感、责任感及安全感;在对家族的意愿方面,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繁衍子孙、崇拜祖先、相互依赖、忍耐、顺从、为家奋斗、长幼有序以及内外有别等。在中国人心目中,家是生存之根,家代表了一种温暖与安全。[2]

家族取向的盛行与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征有极大关联。

* **基金项目**:200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和谐的文化生态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8BSH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128;
黄正泉,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128;
梁剑宏,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128。

正因为如此，流动农村人口也深受这一传统取向影响，他们也需要家的温暖与安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无疑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他们离开农村，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原来的家族关系。同时，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造成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会使他们对于原来的家族关系的距离感远不只是一种空间的疏远，更是一种实质内容的隔膜。他们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既无法融入城市，也无法回归农村，既为城市边缘化，也为农村边缘化，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边缘人"。[3]对于家乡，他们既有浓重深刻的眷恋，也有众多的不满。更严重的是，家乡对他们的容忍与亲切感也在随之渐行渐远。在很多调查与报道中，都反映了这一事实。譬如湖北宜昌的胡清与农村男友的分手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4]胡清与男友自小青梅竹马，长大后男友留在家乡，胡清出外打工，期间胡清虽自愿回家与男友完婚，男友却因为自卑不敢娶她。在这里，胡清男友的自卑其实不光是男友的自卑，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自卑，胡清与男友的距离也不仅是他们俩的距离，其实际代表了流动农村人口进城后形成的与农村文化之间的距离。同时在深圳打工的谭鹏的回乡感受则更直接表达了流动农村人口与原来的家族关系、家族生活的距离。[3]谭鹏在城市虽然没有找到归属感，但回到农村的家中，也已经同样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乡村的晚上让谭鹏觉得寂静无趣，他甚至不愿意出门，对村里的人闹闹哄哄地来打听情况，谭鹏也觉得很烦。并且谭鹏经常习惯用"人家城里人如何如何"来开导父亲。所以"老家"这一概念让谭鹏在遥远的城市生活中虽然时时感觉到一种亲切，不过一回到家就又让他开始怀念城市。这样的不适应与无所归依感，内心的矛盾并非只发生在谭鹏身上，和谭鹏相似，中国有上亿的流动农村人口，在见到城市的生活方式后，再回到农村，就已经在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行事方式等生活细节上，与农村有点格格不入了。家在农村，却生活、工作在城市的流动农村人口，必然处在一种心灵的"异化"状态之中。这种"异化"是他们沿用习惯的生活方式却遭遇生活环境变迁造成的。

"双边缘人"对于流动农村人口的苦痛是双重的。融入城市，为城市所接纳的希望得不到满足会使他们失望。与此同时，生活的需要与变迁又使他们无法回归乡村。为家乡所拒斥，对习惯于家族取向的流动农村人口而言，则无疑更代表了一种伤害。他们虽然远离了家乡与亲人，但更需要家乡与亲人的关爱与鼓励。家园的失落会造成一系列深层次上的心灵的变化，比如矛盾、徘徊、无所适从、紧张，甚至敌意，等等。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的家族取向在流动农村人口实际生活中所形成的困难与矛盾。

二、关系取向面临的失衡与错位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的社会取向，处于次级运作特征的是关系取向。[2]中国有很多学者，如梁漱溟、费孝通等，都曾论及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这一特征。所谓关系取向，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人际关系存在有严重的需求与依赖。中国人通常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来界定自我，寻找自己的身份与角色，这被称为"关系性身份"。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中国人强调关系的和谐性甚至到了不求理由的地步，如果有人破坏了这种和谐，不论他是否有理，都是不对的。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去做符合他人期望的事情，并且在做人的时候要处处小心，要注意给他人面子，尽可能地避免冲突。同时，在传统中国的关系定位中通常都是一组又一组的对立角色，如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君与臣等等，中国人大抵都是依据不同关系中的不同角色来行事做人，认为只要按照角色的责任分工来行事，就会形成人际的和谐与角色的平衡。所以，中国人在面对不同关系的他人时，为了关系的和谐，依据角色的分工，其态度与行为就会立即变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即使面对同一组关系，也会视对方的态度与行为表现而做相应的改变。承继这一传统，流动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后，仍然极度向往人际的和谐。当然，他们在城市中的主要人际已经发生变化，他们所向往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种主要依据于血缘的人际，而更多地向往与城里人的交往。他们最初的交往方式，虽然因为长期的文化定位，让乡里人面对城里人的时候通常存在一种自卑心理，但他们依然采取了一种较为平等的交往原则，即交换原则，也就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人际条件，换取与城里人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流动农村人口至少在最初的时候，应该是维持了一份正常的心态，心理因素并不是造成他们心理困扰的主要原因。但是，作为城里人对于他们要求平等的态度却不尽然。

人们进行社会互动是需要以符号为中介的，利用这些符号进行互动是人类特有的能力。正常的社会互动只有建立在符号意义的正常沟通与理解的基础之上。但在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形成的城乡对立，造成城市无论在社会福利还是话语权威等多方面对农村的剥夺，构成城市与农村的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与意义符号。就这一点来说，流动农村人口所代表的身份意义依然是农民。而农民所获得的是完全不同于城市现代话语体系的，并一直遭受否定和蔑视的传统话语体系。这使得流动农村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出现先天的意义符号障碍。联系到近几年我们一直要求学生对农村进行的自由描绘，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近1000名同学，对农村地区形象进行描绘，他们所使用的形容词大多是关于农村地区负面因素的评价，诸如：传统、贫穷、落后、保守、生活艰苦、六合彩、缺乏时间观念、蚊虫多、生活不便等等，而关于其正面评价的，除了田园生活及自由外，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因为时下学生多来自城镇，所以这些发言可以

说从某种层面代表了城市居民对农村，对流动农村人口的评价。更何况，流动农村人口因为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状态，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根据调查，在流动农村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最高，另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只有小学及以下的教育程度。[5]这更限制了他们对意义符号的接受与理解能力。进城做护工和保姆的王细梅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6]，她在日记中记载自己初到南京的日子，不仅不会使用微波炉、全自动洗衣机，还不知道牛奶有酸奶和鲜奶之分，不知道一个牌子的方便面有那么多品种，不会开关空调，不知道冻干粉是什么，虽然从早到晚都很紧张，但还是尽闹笑话。流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构成对城市居民生活空间与资源的压力，更增添了城市居民对流动农村人口的排斥。也就是说，很多城市居民对流动农村人口所采取的主要互动方式是冲突，而不是竞争，更不是合作；所采取的态度是轻视，而不是平等，更不是理解与包容。正因为如此，在北京禄米仓胡同里的公厕紧张起来的时候，胡同里的居民才会在公厕门口写上“民工禁用”的标语；[7]才会导致城市居民对流动农村人口在城市的辛勤劳动视而不见；也才会让大多数流动农村人口在城市感受更多的是歧视与孤独。[8]

基于社会互动中的交换法则，也依据传统中国人际角色的对应关系，乡里人接下来的角色感受必然作出相应的调整，因为在人际交往中，一旦发现角色扮演的失衡，就会引起当事人的怨恨与悲伤，愤怒与敌意，造成人际苦痛。[2]今天出现的很多流动农村人口的犯罪案件恐怕就说明了这一点。如轰动一时的王斌余案件。[9]王斌余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但他积10年打工体验说出的肺腑之言，却代表了流动农村人口的共同心声，发人深省。他在自白中说：“我的生命事小，我希望党和国家能重视我们农民工，希望社会能够关注我们，尊重我们！”打工10年里，他“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得最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讨薪杀人后，他无奈地说：“我觉得看守所是个好地方，比工地好”。在得知自己一审被判死刑后，他发出声声呐喊：“我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做事挣钱，为何就那么难？”“如果有钱的人欺侮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之所以造成王斌余的敌意，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拿到工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城里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关系取向的失衡与错位，让他甚至于感觉在城里的生活还不如监狱里来得好。

三、权威取向面临的丧失与消解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权威取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的家庭实行父权家长制，在这种制度下，极易形成权威取向。所谓权威取向，一般包含权威敏感、权威崇拜和权威依赖三个方面。传统中国所存在的权威取向使中国人形成天生的权威敏感。他们到了任何一个场所，总会细心地观察或留意，看看有无现成的权威在场，并要弄清楚谁是超乎自己的权威。一般而言，中国人认为在辈分、年龄、职位、能力或学识等方面高于自己的，即是自己的权威。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通常采取绝对化的倾向，并在行为上形成对权威的依赖。如果不能感觉权威的存在，中国人往往会感觉一种不安与危险。[2]但是，在时下的中国，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文化的转型，民主法制的建立，传统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使传统的权威似乎也在随之不断地丧失自己的权威地位，从而使中国人难以清楚地感受与判断权威的存在，传统的权威面临逐渐地丧失与消解的危险。

这种丧失与消解的危险对流动农村人口来说，显得尤其严重。流动农村人口远离家族关系进入城市，加上现代生活中家庭关系的民主化，意味着辈分权威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渐行渐远。而随着辈分权威的消解，年龄成为权威的依据似乎也在丧失。更重要的是，对于流动农村人口而言，传统的处于首要地位的政治权威的影响也在不断下降，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在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对当地基层政府的依赖和信任度在降低。董海军以湖南塘镇为例对于乡镇干部群体的角色研究，发现乡镇干部身上出现的角色困境与影响的弱化，即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10]在另一方面，与流动农村人口发生更多更直接关系的职业权威是他们的老板、包工头等，但他们对于流动农村人口等打工者平日里管理方法的简单粗暴，尤其是严重的拖欠工资等行为更让流动农村人口对他们感到不齿。所以传统的职位权威依据也在消解。这种权威的丧失对于流动农村人口的意义，不光是意味着权威崇拜的消失，更严重的是使他们的生活缺乏一种外在的保护，从而极端地欠缺一种生活的安全感。这会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提高警惕”，而警惕之心所意味的人际关系绝对不是一种合作与和谐，它更多地向我们所展示的是一种趋向对立与敌意的人际互动。

四、他人取向面临的缺位与敏感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人取向。[2]他人取向是指中国人的自我价值的存在与实现依赖于他人的评价与态度，从而在心理与行为上易受他人影响的一种强烈趋向。这造成中国人对他人的意见、标准、褒贬、批评特别敏感而且重视。在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氛围中，中国人没有个体的概念，他们在心理上希望在他人心目中留下好印象，对他人的意见非常敏感，往往花很多时间打听别人的观点，尤其是对自己的看法。他们通过别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他们不愿意自己表现得与众不同，而是在行为上尽量刻意顺从他人，以努力达到并保持与他人的和谐与一致。正

因为如此，社会规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成为自己言行的主要依据。当然，这里的规范不是指法律，实际上中国人对人际规范的强调要远胜于法律，中国人对他人的评价，也就是名誉的重视也远胜于其他。中国人很看重自己的名誉，所以他们经常调整自我监控的方式与内容，以使自己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人，不是用来做事。

在他人取向影响下，流动农村人口自然也会为谋求一个好的评价和名誉，而孜孜不倦地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村人口对外界任何一种反映与评价都会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所以，在他们的人际交往中，才会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调查显示，虽然有 57.10%的农民工表示市民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平等、友好和友善的，但同时差不多所有的被调查者都会选择一项内容——即感到“城里人对自己有不同表现的歧视”，其中 92%的人有亲身经历。[8]在流动农村人口中存在如此之高的受歧视感受人群，当然与城里人的高傲自负有关，但也必然与流动农村人口本身的自卑与敏感相关。在另一方面，对于流动农村人口的伤害还来源于他人取向的缺乏。良好的社会互动关系的建立，必须以互动的各方拥有良好的互动知识和技术为基础。所以互动论者通常希望社会成员能够学会友善地同他人相处，学会有效生活所必需的技能，学会以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方式生存于客观世界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具有无穷活力的社会关系系统，从而真正达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流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后，一方面，原有的人际关系在疏远，另一方面，又由于缺乏必要的互动知识和技术等原因，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城市中难以形成新的人际网络，自然也就难以从他人那里获得相关信息的交流，导致难以言表的孤独。正因为如此，来自四川的打工者何建清，才会仅仅为了引人关注，找到一个人来听他倾诉，与他交流，而在公交车上制造“炸弹”事件。[11]

五、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社会互动观点，流动农村人口在人际互动中从行为习惯出发，采用传统的社会取向，其本身心理状况是完全正常的。而在他们进入城市的生活与工作过程中，却因为遭遇社会与生活环境变迁，形成家族取向的困难与矛盾，关系取向的失衡与错位，权威取向的丧失与消解，他人取向的缺位与敏感。传统的社会取向难以为继，让他们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形成一定的人际互动障碍，这才进一步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倍感矛盾、孤独、不安、苦痛、屈辱、无所归依，甚至于绝望，从而造成明显的心理困惑与冲突。因此，流动农村人口所存在的心理困扰不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而是藉由不良的人际互动的结果。更何况，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人的社会取向随着其物质基础——农耕经济地位的降低而有所削弱，个人取向在逐步加强，这两种取向虽完全不同，但同时存在，其力量日益趋向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会造成身处其中的个人内心的极度冲突与紧张，从而形成心理困扰。简单地说，流动农村人口心理困扰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变迁与人际互动。当然，这种心理困扰在某些流动农村人口中已达到相当突出的程度，才受到社会如此广泛的关注与重视。但是，流动农村人口心理问题的成因主要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心理因素造成的，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其中尤其是社会人际环境的结果。所以，要真正帮助他们摆脱心理困扰，简单的心理学方式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心理咨询的主要对象通常是那些存在较为明显的心理疾患者，但大多数流动农村人口所出现的心理问题只不过是人际变迁造成的心理困扰，以及因为人际交流的缺乏造成的心理孤独及对心理倾诉的需求。因此，仅仅将其当作心理咨询的专业行为，容易导致对当前流动农村人口心理问题认识的严重化趋势。只有从社会环境入手，依据社会学的方法才能真正行之有效。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必须也完全可以探索心理学以外的其他途径，来建立合理的社会心理救助体系。基于这种考虑，流动农村人口心理困扰的社会学考察应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年，第 303 页。

[2]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06 年第 1 期。

[3]文张：《聚焦中国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与农村的双边缘人》，国际先驱导报，2005 年 7 月 5 日，第 19 页。

[4]周盛平：《流浪城市的年轻农民工：工钱不易讨，情侣更难求》，半月谈内部版，2004 年第 7 期。

[5]王春光：《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社会学，2005 年第 5 期。

[6]黄红芳：《从日记看一位农民工的心路历程》，新华日报，2006 年 5 月 12 日，第 2 页。

[7]孙庚：《至少给外来民工一个“方便”的去处》，南方都市报，2004 年 1 月 10 日(A19)。

[8]张戈：《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浙江人大，2005 年第 1 期。

[9]孟昭丽：《谁该为王斌余悲剧的发生负责?》，人民政协报，2005 年 9 月 21 日，第 2 版。

[10]董海军：《乡镇干部群体的角色实践及其弱势化：一项类型学的观察》，社会，2005 年第 6 期。

[11]高柱：《关爱农民工应从“心”开始》，工人日报，2006 年 3 月 7 日，第 3 版。

责任编辑：刘峰